

“双重运动”与现代国家的兴起： 评波兰尼的《大转型》

刘守刚*

卡尔·波兰尼著，冯钢、刘阳译（2007）. 大转型——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. 杭州：浙江人民出版社. 共 274 页.

在许多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眼中，人类现代化是自由原则从经济领域不断地向社会、政治领域扩张的结果，即在自利动机的驱使下，所有的经济主体都积极投身到自由交易活动中，并由此推动形成一个自由的市场、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国家。

对此，卡尔·波兰尼（Karl Polanyi）表示反对。在他看来，真实图景远为复杂，今天的政治、经济，实际上起源于一个“双重运动”^①（double movement）：一方面是市场原则不断扩张的运动，另一方面是在虚拟商品（即劳动力、土地和货币^②等要素）领域中，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。“一

* 刘守刚，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，副教授。

① 关于“double movement”，有的学者采用“双向运动”的译法，而本文采用了《大转型》一书中译本所使用的“双重运动”一词。该书所描述的“市场运动”和“反对市场的运动”不能完全称为“双向”，正如本文即将论证的，“反对市场的运动”有两个方向，一个取向过去，一个取向未来（超越），再加上市场运动本身的方向，这样很难用“双向”来概括，而用“双重”则相对更为准确。

② 这种生产要素，波兰尼使用“货币”一词来表达，而今天的经济学一般使用的词语是“资本”。两个词语的指向相似，但含义有区别。本文对此未进行严格区分，多数时候用“货币（资本）”的说法来统称。

方面，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，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；另一方面，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，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、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……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，社会奋起保护自己。”（第66页）

《大转型》一书，在社会科学领域曾引起广泛的关注，尤其是其中的“双重运动”及“内嵌的市场经济”等概念，影响了后来许多研究。本文的目的，是通过解读该书，来整理上述“双重运动”所涉及的相关内容，并将其发展为一个“双重运动模型”。本文认为，该模型对现代国家如何兴起这一重要问题颇具解释力，对理解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国家转型也很有意义。

一、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：双重运动之一

正像波兰尼在书中一再指出的，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认为，人类在自然状态中具有一种互通有无、互相交易的秉性。这种所谓的个体交换的秉性，导致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出现，由此形成远程贸易和地域分工。因此，在自由放任的前提下，市场经济将能够自发形成，并自主运转和成长，不需要政府的干预。

波兰尼的看法是，在我们的时代之前，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，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，此前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（第37页）。古典经济学的看法显然是对过去的误读，纵然它是对未来的准确预言。在他看来，真实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：起点是远程贸易，它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果；远程贸易经常会产生各种市场，不仅包含着以物易物，而且如果使用货币的话，它还包括买和卖，但在任何程度上都不是必然地为某些个体提供一个机会，让他们得以沉浸在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。换言之，尽管远程贸易有史以来一直存在，但它并不意味着个人的交易秉性，也不带来

市场经济。虽然存在着零星的市场，但那只是其他经济形式的附带现象。

在该书中，波兰尼描述了近代市场经济诞生以前所存在的三种经济形式，它们分别是互惠经济、再分配经济和家计经济。

互惠经济的运转，依靠对称式的组织安排。例如，在特罗布里恩群岛（Trobriand Islands），每一个沿海村庄都与岛内的某个内陆村庄结成对等的交换关系，以互赠礼物的形式来实现互通有无。再分配经济，则从辐辏结构得到助益。例如，埃及和中国这样的古老王国，通过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粮仓和货仓，实现对全国物品的集中和贮存，并通过这些仓库将各种物品分配出去。而家计模式，则以自给自足原则为基础。例如中世纪的庄园，就是这种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的单位。波兰尼指出：“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，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，要么是再分配，要么是家计，或者是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。……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，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，盛行的是其他种类的制度模式。”（第47页）

总之，虽然在互惠经济、再分配经济和家计经济中，市场多少都存在，但以自由交易为原则组织起来的市场经济，却是近代的现象。至于为什么市场经济能够取代其他经济形式，成为近代的主要形式，波兰尼在书中只是从外因给出一个解释，即市场经济起源于同经济体内部组织无关的外部领域之中（第55页）。他认为，在15至16世纪，欧洲各国政府运用重商主义政策，将市场制度强加于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、公国或行会头上，他们动用权力和行政管理技术，摧毁阻碍贸易的封建割据势力，从而“将商业和贸易扩展至整个国家疆域，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形式”（第57页）。因此，“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”（第55页）。

可为什么偏偏直到15、16世纪，欧洲各国才用权力创造出市场？波兰尼对此并没有进一步追究其内在的动因。但是他非常明确

地指出，市场经济必须以权力所创造出的市场社会为前提，它是内嵌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中的。也就是说，市场经济体系是依靠非经济动机得以运转的。实际上，经济制度仅仅是社会组织的功能（第40页）。在他的眼中，市场从来不是自发形成的，更不会自发运转。

不过，波兰尼并未忽视市场经济形成后，就开始出现的对减少国家干预、实行自发调节的要求，即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。他将经济自由主义归因于工业的要求，也就是说只要用精致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，有关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会形成，因为机器工业生产涉及长期投资以及承担相应的风险，需要自主决策和自由交易（第35页）。

波兰尼特别强调的是，在近代出现的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要求，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，能够将自发调节、自由交易的教义扩张到社会领域中去。他说：“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：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……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、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，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的方式来型塑自身。”（第50页）这种“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”，主要指的是将市场原则扩张到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中，也就是说要将土地、劳动、货币（资本）等要素纳入到市场原则中，使其成为市场经济体系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。

二、反对市场原则扩张的运动：双重运动之二

正如波兰尼指出的，劳动力、土地和货币（资本）并非商品（商品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），只不过分别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（劳动力）、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（土地）和立足于人类心理的购买力象征（货币）。要将它们纳入到市场中，就必须通过某种虚构的方式。

可是，如果将要素纳入市场原则之下，这“就意味着使社会生

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”，人类社会就会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，市场机制将成为人的命运、人的自然环境，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“唯一主宰”（第62页）。对这一后果，社会兴起了种种反抗运动，政府也建立起各种措施和制度来加以限制。这就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，即在劳动力、土地和货币（资本）等要素方面，市场原则的扩张受到了限制或者被反抗。

（一）劳动力方面

1795年，英国法官颁布了斯品汉姆兰法令（Speenhamland Law），它确定一个穷人维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水平，宣布如果某个穷人从工作中挣得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，那么当地教区或地主必须补足这部分差额（第70页）。这一法令为穷人建立起仁慈的家长制度，以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。但是，该法令在事实上却将原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，限制在旧封建关系（教区、地主）的束缚中，因而妨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建立。因此，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实质，是用传统的封建关系和力量来阻碍劳动力的市场化。

19世纪开始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，同样属于将劳动者从商品化境地挽救出来的努力。波兰尼强调，“从历史上说，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是同时出现的”（第87页）。因此，与斯品汉姆兰法令不同，反对将劳动力市场化的工人运动，并不否认工业革命的历史方向，但它希望使劳动者成为机器的主人，希望工人的生活中除了工资外，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、家庭环境、商品质量、雇佣关系稳定等多个方面（第146页）。总之，它要的是工人摆脱劳动力作为单纯商品的命运，而成为全面的人。在书中，波兰尼以欧文主义运动、宪章运动以及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例，来说明工人阶级的努力，以及由此而取得的对自身的保护。在欧洲大陆，工人“主要通过立法来取得这种保护”，而英国的工人“更多是依靠资源的联合——工会——或者是他们对劳动力的垄断权”（第150页）。

当然，现实中还出现了既反对工人运动，又反对市场经济，同时要求对社会进行保护的一种反动思潮和情绪。在波兰尼看来，法西斯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思潮。它是在市场经济和大众民主处在普遍危机之中诞生的，其本身没有一种可被认可的标准，也没有惯常的信条。法西斯主义服务于民族问题，只不过是它碰巧“捡到的”工作（第 203 页）。

（二）土地方面

英国的圈地运动，是土地贵族将归属于他们名下但按习惯由村舍公用的土地（或者荒地），标出明确的产权关系（圈围起来），将其出租成为牧地，用于高利润的养羊业，从而在实质上将土地这一要素纳入到市场中。从市场原则来看，圈地运动应该是一场“进步”，它提高了生产效率，提升了土地的收益和价格。但是，这一运动搅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，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，造成了众多的失地农民。尤其是其中存在的诸多暴力行为，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痛苦和混乱。

为了使这种痛苦和混乱不致于毁灭社会共同体，在圈地运动中王权站到了市场的对立面。而原来在商品市场中，王权曾坚决地站在市场一边，运用重商主义政策来促进市场的发展。此时，国王和他的枢密院，巧妙地利用封建特权去制止土地性质的改变，运用王室法庭打击圈地运动中的暴力行为。虽然国王的反圈地行动未能阻止土地市场化的历史潮流，但这一行动本身并非毫无意义。一方面，在与各土地贵族斗争的过程中，王权得以壮大，国家力量不断成长。另一方面，反圈地运动延缓了市场化的进程，减轻了受害者的痛苦，使市场化的速度减缓到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。正如波兰尼明确指出的，“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，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，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”（第 32 页）。

自由原则延伸到土地要素这一潮流毕竟无法阻挡，到 19 世纪

中期英国土地交易中的契约自由得到了法律的认可，“土地的商品化只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”（第153页）。在欧洲大陆，尽管市场力量在土地领域同样取得重要的进展，但情况有所不同。因为土地利益集团（地主、教会和军队）找到了一个可扮演的新角色，成为王权和国家的保卫者，在19世纪这个动荡时代发挥着秩序维护和社会团结的功能。在19世纪，与这股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浪漫主义思潮，也是通过对土地作为人类自然栖息地和传统文化价值保存者的捍卫，来发挥限制土地商品化的作用。

（三）货币（资本）方面

如前所述，交易自由的原则作为自由主义信条，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，货币（资本）市场同样是不容国家干预的。因此，以黄金作为货币本位，并在金本位制基础上形成资本市场和国际经济秩序，是最为可取的经济制度。这是因为，货币（黄金）的数量取决于自然产量，而不决定于政府的决策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（货物进出口和投资），由各国货币的含金量及各国生产率决定，通过黄金的自由流动而调节。建立于金本位制基础上的资本市场，也因此可自由升落而无需政府的介入。

但问题是，金本位制有一个根本的缺陷，那就是黄金的数量不能按照需要而增长，它的产量往往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。如果实际生产能力快速增长，或者如果商品交易量突增，在没有代币的情况下，（黄金）货币过少就会导致价格下降，引发市场萧条和经济萎缩，并带来失业（第165页）。也就是说，不定期的经济萧条几乎是金本位制内在的缺陷，而商业可能会被毁于这种经济调整过程之中。因此，货币和资本市场中的自由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，首要的就是放弃金本位制。

于是，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，中央银行首先被发展起来，以一定的代币来缓解金本位制的缺陷（第169页）。尽管支持金本位制

的众多理由仍然值得人留恋，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。今天的世界各国，都已通过中央银行将货币的控制权转移到市场之外，并将货币政策引入到政治领域之中（第168页）。由此形成的一个后果是，只有那些拥有一个中央银行控制货币（资本）体系的国家，才被认为是主权国家（第214页）。

三、“双重运动模型”与现代国家的兴起

综上所述，波兰尼在《大转型》一书中，用“双重运动”图景来概括我们时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，雄心勃勃地为近代以来种种政治和经济现象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，这些现象包括圈地运动、斯品汉姆兰法案、宪章运动、浪漫主义运动、社会主义运动、法西斯主义运动，直至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。应该说，波兰尼的雄心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成功，这本书也因此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史领域的经典著作。

不过，以今天的眼光看，波兰尼上述双重运动中未能明确区分的是，在劳动力和土地两种要素上的第二重运动，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力量来源：一个来源于旧的力量，其反对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返回过去的社会关系（封建关系），可称为反市场的力量，如反“圈地运动”和斯品汉姆兰法令；另一个来源于新的社会力量（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力量），反对市场的目的在于超越当前以获利为动机的社会关系，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，这可称为超市场的力量，如工人运动。

在此基础上，如果将第二重运动中政治的内容（国家管制措施与制度的发展）分离出来，并用经济和社会内容来解释政治内容，即用第一重运动中市场的扩张和第二重运动中社会的反抗，来解释国家的发展，就可以构建起一个运用经济和社会运动来解释现代国家兴起的模型。本文称这一模型为波兰尼“双重运动模型”（图1），认为它有助于回答“现代国家从何而来”这一重大政治学问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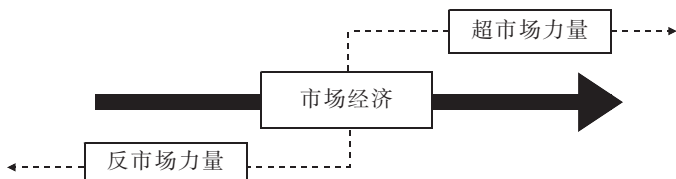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双重运动

在图1中，主要的和中心的位置，表示的是波兰尼所述的第一重运动，即以交易自由为原则的市场经济，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，并成为近现代发展的主要潮流。波兰尼所述的第二重运动，图中只保留了社会对市场原则的反抗，这种反抗力量又被细分为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两种。超市场力量与市场经济在面向未来这一方向上是一致的（如对工业革命的肯定），只不过力图超越于市场关系而寻求更美好的社会制度；反市场力量则采取了与市场经济相反的方向，力图将经济纳入到过去的社会关系中。

由此，波兰尼“双重运动模型”所阐述的经济社会运动与现代国家兴起之间的关系如下：经济与社会现代过程包含双重运动，第一重运动是市场原则的扩张运动，第二重运动是社会从两个方向反抗市场扩张的运动；在应对这个“双重运动”的过程中，现代国家逐步发展起来。

这一现代国家的发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：

1. 一方面，国家的权力和机构，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，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，“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”（第55页）；
2. 另一方面，国家不断地调适和增加职能，以限制要素市场中的交易自由，降低要素市场化对社会的破坏，部分地满足反市场力量和超市场力量的要求；
3. 与此同时，国家也限制这两种反对力量，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，并通过吸收其中的合理要求，得以进一步发展。

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一模型也可用来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历

史进程进行一定的解释，以帮助理解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国家转型。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，最为突出的方面是西方列强所带来的市场原则不断的扩张，以及中国革命力量对这一扩张的种种反抗。在反对市场原则（资本主义）方面，工人和农民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因而可结成联盟；农民人数最多，可作为革命主力军，但其方向毕竟是逆现代化潮流（如工业化）的；这就需要人数虽少，但却诞生于市场经济中、具有现代化方向的超市场力量——工人阶级的领导。就此而言，中国革命的成功，是超市场力量与反市场力量结盟的结果，这一结果同时指向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现代化方向。1978年后中国在市场化的方面取得的进展，无非是该模型中的第一重运动（市场原则的扩张）的结果，或者说是中国的发展汇入现代化的主潮流。当然，这一市场化的进展同样也引起社会的种种反抗，并进而对国家制度的发展提出了要求。